

# 唐朝军政统治的终局与五代十国割据的开端

[日本]山根直生

(浙江大学 历史系,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要]淮南节度使高骈在史书中一直被认为“惑于神仙之说”,通过对崔致远《桂苑笔耕集》考察,却发现这是淮南节度使实行的一种改革。它的目的是克服唐王朝军政、财政全面崩溃的困境,使其走向完全独立化。“妖人吕用之之党”其实具有下层商人的特性,而且跟扬州周边有盐铁专卖的关系,因此可以说是改革的旗手。促使他们灭亡的原因就是当时各州府互相斗争的状态的持续,这到五代十国时也成了诸势力的政治课题。

[关键词]高骈;吕用之;淮南节度使;割据

[中图分类号]K2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942X(2004)03-0071-10

近年来,随着关于安禄山起义以后的唐代史研究的进展,学术界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如有学者认为:即唐后半期未必是分裂割据,而是藩镇构成了一个既密切联系又互相制约的整体结构,并从而维系唐王朝相对稳定地统治了一百多年[1](p.25)。具体地说,支持唐朝统治的因素,比如对令制官的任用权的统一[2](pp.938-946)等等,到黄巢起义时都一直维持着。如果按照这种看法,有些问题得考虑。第一,唐朝的根本性崩溃,到底发生在什么时候?它是怎样开始的?第二,唐朝崩溃后的五代十国,尤其是十国,是在什么基础上建立的?以前学者们一般都将其视为藩镇割据的延续。关于唐朝根本性崩溃的时间,可以说是从黄巢起义开始的。本文将举唐末淮南节度使高骈(?—887)与吕用之(?—887)的个案,对上述第二个问题提出一些看法。

前人对于高骈的看法,主要依据的是罗隐(833—909)的《广陵妖乱志》[3]一书。其实此书本来就有批评高骈的意图,不一定公允。高骈的幕僚崔致远(837—?)的传世文集《桂苑笔耕集》[4],对于了解淮南节度使的举动和880年前后的情况很有意义,可是《资治通鉴》[5]、《旧唐书》[6]、《新唐书》[7]等史书之中引用它的并不多<sup>①</sup>。少数虽然已注意利用《笔耕集》记载的一些研究,但也没有考虑淮南节度的组织性特点,因此存在着相当大的可以深入研究的余地。本文认为,唐末淮南节度使的情形是东南地方从一个地方行政单位向五代割据王国转变的典型,通过这一个案也可以验证唐朝变革的实际情况。

## 一、“东南财源型”地方的情况和唐后半期的军政

当时唐朝各地的藩镇,实际上是各种各样的。张国刚提出了“藩镇的四种类型”即河朔割据型、中原防遏型、边疆御边型、东南财源型的看法。淮南当属东南财源型,它的特点有二:一是兵力寡

[收稿日期]2003-02-11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作者简介]山根直生(1973—),男,日本冈山县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唐五代社会史研究。

①《广陵妖乱志》是为《桂苑笔耕集》及司马光《资治通鉴》的主要史料,下面简称《妖乱志》、《笔耕集》及《通鉴》。

弱,二是财富丰赡[1] (p. 24)。据此,浙东、浙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荆南九道可总称为东南藩镇,或者东南财源型藩镇。补充说明的是,东南藩镇所统治的地方社会为了支持唐朝安定所形成的“兵力寡弱”和“财富丰赡”的特点,却为本地区带来了社会治安恶化的恶果,各地农村的自卫武装也是由此引起的。杜牧(803—853)曾说过:“自十五年来,江南、江北,凡名草市,劫杀皆遍,只有三年再劫者,无有五年获安者。”[8] (pp. 99—101)唐朝政府对此特别是对于大规模起义实施过一些对策。关于黄巢起义以前在东南发生的起义,即裘甫、庞勋、王郢等人的起义,史有明文,但若仔细分析一下唐朝镇压它们的军事行动的特点,是颇有意义的(参见表1)。据下表可知,这三次起义都发生在东南和它的周边地区,可是唐朝所调发的镇压起义的兵力,大部分来自东南以外的地区,主要是中原防遏型藩镇。总之,在东南藩镇的内部,为了防止其割据,唐朝中央政府不敢配置相当的兵力。对中原防遏型藩镇的兵士来说,出防东南藩镇可能已经成了一般性的任务。

表 1 唐后期出兵镇压东南地区起义的各地节度使

资料出处		各地出兵的不同类型节度使
镇压 裘甫 起义	T 卷二五〇咸通元年三月辛亥朔	忠武②、义成②、淮南④
	T 卷二五〇咸通元年五月	忠武②、义成②、昭义②、望海镇④、浙西④
	《嘉定赤城志》卷四〇《辨误门》关于桐柏观元镇碑阴条[9]	义成②、武宁②、兖海①、宣润④
镇压 庞勋	J 卷一九《懿宗纪》咸通九年十月	河东②
	J 卷一九《懿宗纪》咸通十年正月	忠武②、太原②
起义	X 卷一四八《唐承训传》	魏博①、郾延③、义武②、凤翔③
镇压 王郢 起义	T 卷二五三乾符四年正月	忠武②、宣武②、感化②、宣州④、泗州②、二浙④、福建④
	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一二〇乾符三年六月[10]	福建④、虔州④、吉州④、衢州④、婺州④、忠武②、感化②、泗州②、宣州④

说明 1. 仅举典型事例,沙陀等非汉族诸部族除外。  
2. 征引文献的代号:Y《妖乱志》[3];B《笔耕集》[4];T《通鉴》[5];J《旧唐书》[6];X《新唐书》[7]。表中未写中华书局点校本等页码。  
3. 节度使类型代号:①河朔割据型;②中原防遏型;③边疆御边型;④东南财源型。

其次,关于在东南的唐朝军政的详细情况,从东南以外调发前来的各藩镇的军队,他们是由谁指挥的?兵士被怎么运用?属于哪个集团?关于调发前来镇压起义的军队指挥的情况,尤其是关于裘甫、庞勋两次起义,据《通鉴》卷二五〇咸通元年四月与同年五月[5] (pp. 8083—8086)及《旧唐书》卷一九《懿宗纪》咸通十年正月己丑[6] (pp. 664—665)等史料记载,有三十名左右武将的姓名。其中,除了著名的王式、朱邪赤心以外,还有几个人的情况是比较清楚的(参见表2)。

据表2可知,这些人都历任边疆御边型藩镇的武将,而且好像康承训、马举<sup>①</sup>都跟唐朝禁军有关系。根据他们的传记和姓氏来考察[11] (pp. 98—101),其中多数人可能是出于非汉族血统的部族。总之,他们就是唐朝的藩将,在唐朝中央政府与禁军的关系非常密切,因此,他们一直从事镇戍边疆、镇压起义的工作。他们所有的这些特点都是跟高骈属同一类型。因为高骈原来也是出于渤海的血统,他是神策军的武将,又历任了天雄、静海、剑南西川等地的边疆御边型节度使。

① 根据《旧唐书》卷一九《懿宗纪》咸通六年五月条,马举原来也是神策大将军。

表 2 镇压东南地区三次起义武将的履历

武将姓名、履历		资料出处	任地类型
张 茵	( 860 )作为义成将或者忠武将，镇压裘甫起义	T 卷二五〇咸通元年五月，又同年六月甲申	③
	( —864 )容管经略使	T 卷二五〇咸通五年正月	
	( 864— )岭南西道节度使	T 卷二五〇咸通五年七月	
李师望	( 860—863 )作为台州刺史，镇压裘甫起义，863 年“罢郡，九月十一日北归”	《嘉定赤城志》卷四〇《辨误门》关于桐柏观元绩碑阴条[ 9 ]	③
	( ? —868 )凤翔小尹	T 卷二五一咸通九年六月	
	( 868—869 )定边节度使	同上，又 T 卷二五一咸通十年十月	
康承训	( —861 )天德军防御使	X 卷一四八《康承训传》( 下面均据此 )	③
	( 861—863 )义武节度使	T 卷二五〇咸通四年三月	①
	( 863—864 )岭南西道节度使	同上	③
	( 869 )作为右神策大将军、徐泗行营都招讨使( 或者义成节度使、徐泗行营都招讨使 )，镇压庞勋起义	J 卷一九《懿宗纪》咸通十年正月己未朔	②
	( 869—870 )河东节度使	J 卷一九《懿宗纪》咸通十年十二月，又 T 卷二五二咸通十一年正月辛酉	
	( —869 )陇州刺史	T 卷二五一咸通九年闰月之考异	③
曹 翔	( 869— )作为兖海节度行营招讨使，镇压庞勋起义	J 卷一九《懿宗纪》咸通十年正月己未朔	②
	( 875— )昭义节度使	T 卷二五二乾符二年十月	
	( 878 )河东节度使	T 卷二五三乾符五年六月	
马 举	( 865— )天雄节度使	J 卷一九《懿宗纪》咸通六年五月	③
	( 869 )作为扬州都督府司马、淮海行营招讨使，镇压庞勋起义	J 卷一九《懿宗纪》咸通十年正月己未朔	

关于那些调发前来的士兵究竟是如何被运用的问题，我们要参考被派遣到边疆御边型藩镇的中原防遏型藩镇兵士的情况。特别是在西南边疆御边型藩镇，随着咸通年间开始的南诏等周边诸民族反抗的激化，唐王朝从中原防遏型藩镇派遣了大量兵士出征。比如，根据《通鉴》卷二五二咸通十一年正月癸酉条[ 5 ]( p. 8155 )，当时( 870 )在定边节度使( 邛州 )驻屯着来自忠武、义成、武宁节度使的兵士。尽管兵士驻屯在别的藩镇，还是按照本来所属的藩镇单位行动，并受同乡的下级指挥官领导。而且一部分兵士被挑选作为精锐，并随着藩帅移镇，一同被派遣到新的任地去。

关于上述问题，最清楚的例子是发动起义以前的庞勋集团。《旧唐书》卷一七七《崔彦曾传》有如下记载：“( 咸通 )六年，南蛮寇五管，陷交趾，诏徐州节度使孟球召募二千人赴援，分八百人戍桂州。旧三年一代，至是戍卒求代，尹戡以军帑匱乏，难以发兵，且留旧戍一年。其戍卒家人飞书桂林，戍卒怒……杀都头王仲甫，立粮料判官庞勋为都将。”[ 6 ]( p. 4581 )值得注意的是，驻屯在桂州的庞勋等兵士的待遇，都是由本来所属的武宁节度使决定的。与此同时，他们在桂州也收到“家人飞书”。又，咸通九年九月戊午，庞勋说“吾辈擅归，思见妻子耳”[ 5 ]( p. 8127 )，兵士个人也跟本来所属藩镇的亲族保持着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关系。在出征五六年的西北、西南边疆御边型藩镇既然如此，

更何况出征仅一两年的镇压起义的军队呢？并且根据《旧唐书》卷一九《懿宗纪》咸通十年九月〔6〕（pp.670－672）的镇压庞勋起义以后唐懿宗所颁布的诏制：“诸道行营都将已下节级军将”、“四面行营将士”、“行营人”等人的赏赐、免差役、酬奖等等，都是由本来的藩镇来供给，他们回原藩镇后才可以收到这些赏赐。由此可见，出征兵士的财政机构也不是归属东南藩镇，而是属于本来的藩镇。

以上是黄巢起义以前包括淮南在内的东南藩镇的情况及唐王朝在当地的军政措施。高骈与其部下的种种举措，正是由这些历史前提所决定的。

## 二、高骈的军政机制及其未出兵的原因与影响

到广明元年（880）七月黄巢渡江时，高骈将对黄巢采取什么措施呢？在军政方面，他的计划是完全按照唐朝的先例。《通鉴》卷二五三广明元年三月记载：“骈乃传檄徵天下，且广召募，得土客之兵共七万。”又其注记载：“土兵，谓淮南之兵也，客兵，谓诸道之兵也。”〔5〕p.8223〕又据《通鉴》同卷同年五月条，其中不少兵力是从昭义、感化、义武等节度使（即河朔割据型、中原防遏型藩镇）征调来的〔5〕p.8225〕。我们可以根据《通鉴》等记载来了解当时高骈统率下武官的阵容（参见表3）：

表 3 高骈所统率的武将阵容（879—887）

姓 名	与高骈的关系	吕用之发迹前的官职与职责	吕用之发迹后的官职与职责
高  濂	高骈从子（T 卷二五五中和四年三月）	左骁卫大将军（同左）	知舒州事。反对吕用之，因此被高骈暗杀
高  杰	高骈的从子（T 卷二五七光启三年四月丁巳、戊午）	左金吾大将军（同左）	都牢城使（同左）
张  璘	从镇海节度使时随高骈（T 卷二五三乾符六年八月）	都知兵马使（同左）败于黄巢，死（T 卷二五三广明元年五月）	
梁  纘	原来昭义节度使的爱将。出征西川时，跟高骈相识，成高骈的亲将。“历数镇，以本军所籍兵三千随之。”（《册府元龟》卷四四七，将帅部 纵敌〔12〕）	“初败黄巢于浙西，皆师铎、梁纘之效也”，被高骈宠爱（J 卷一八二《毕师铎传》）	反对吕用之抬头，“骈不听。纘惧，解所领兵，骈还其军于昭义”（X 卷二二四下《高骈传》），毕师铎起义时，“骈召梁纘以昭义百余人保子城”（T 卷二五七光启三年四月辛酉）
陈  琪	高骈的旧将（Y）		被高骈族灭（T 卷二五四中和二年四月）
冯  绶	高骈的旧将（Y）	押衙（B 卷一一《答江西王尚书》）	于高骈“疎退”（Y）
董  瑾	高骈的旧将（Y）	前知庐州事（T 卷二五六光启二年五月）	于高骈“疎退”（Y），入吕用之之党（T 卷二五六光启二年五月）
俞公楚	高骈的旧将（Y）	左骁雄军使（T 卷二五五中和三年三月），中军使（B 卷一八《谢新茶状》）	于高骈“疎退”（Y），将暗杀吕用之，却被谋杀（T 卷二五五中和三年三月）

续表 3

姓 名	与高骈的关系	吕用之发迹前的官职与职责	吕用之发迹后的官职与职责
姚归礼	高骈的旧将( Y )	右骁雄军使( T 卷二五五中和三年三月 )	于高骈“ 疎退 ”( Y ),将暗杀吕用之 却被谋杀( T 卷二五五中和三年三月 )
雷 满	武陵蛮。高骈成荆南节度使时 , 领蛮军。成高骈的部曲(《旧五代》卷一七《雷满传》) [ 13 ]	“ 中和初 , 擅率部兵自广陵逃归于朗 , 沿江恣残暴 ”( 同左 )	
张 瓌	渭州人( T 卷二五六光启元年正月 )	“ 叛高骈 , 据复、岳二州 , 自称刺史 ”( 同左 )	
韩师德		跟张瓌行动( T 卷二五六光启元年正月 )	
申 及	徐州健将( T 卷二五七光启三年四月 ), 高骈的爱将( X 卷二二四下《高骈传》)		左莫邪都虞侯( T 卷二五七光启三年四月 )
安再荣	定边节度使的都头( T 卷二五一咸通十年十一月 )。根据姓推测 , 可能是 Bokhara 的血统	管临淮郡( B 卷一四《安再荣管临淮郡》), 行营都指挥使( B 卷一四《安再荣充行营都指挥使》)	
任从海	西川的官健 , 随高骈来淮南( B 卷五《奏请天征军任从海衣粮状》)	天征军都将( 同左 )	
张 雄	淮南人 , 又名张神剑( T 卷二五七光启三年四月 , 又其考异所引的《十国纪年》)		楚州刺史( B 卷一三《楚州刺史张雄将军》), 白沙镇将( B 卷一四《张雄充白沙镇将》), 高邮镇遏使( T 卷二五七光启三年四月 )
高 霸	高昌即洪州人“ 高骈将也 ”( T 卷二五主光启二年六月 )		海陵镇遏使( T 卷二五六 , 光启二年六月 , 又 B 卷一二《海陵镇高霸》), 权知江州军州事( B 卷一三《授高霸权知江州军州事》)
吕用之	“ 鄱阳茶商之子也 , 久客广陵 , 熟其人情。 ”( T 卷二五四中和二年四月 ) 高骈在镇海时“ 以其术通于客次 ”, 接着“ 鼎宠之暇 , 妄陈时政得失 , 渤海益奇之 , 渐加委杖 ”( Y )	观察推官( Y )	右莫邪军使( T 卷二五四中和二年四月 ), 山阳军都知兵马使( B 卷一四《吕用之兼管山阳都知兵马使》), 右都押牙、和州刺史( T 卷二五六光启二年五月 )
张守一	“ 沧、景田里人也……自言能易五金 ”, 成萧胜的门下时跟吕用之相识(《太平广记》卷二八九《张守一》) [ 14 ]		左莫邪军使( T 卷二五四中和二年四月 ) 检校左仆射( 同左 )

续表 3

姓 名	与高骈的关系	吕用之发迹前的官职与职责	吕用之发迹后的官职与职责
毕师铎	曹州冤句人,成了黄巢军将,乾符六年降顺于高骈(T 卷二五三乾符六年正月)	“初败黄巢于浙西,皆师铎、梁缙之效也”,被高骈宠爱(J 卷一八二《毕师铎传》)左厢都知兵马使(T 卷二五七光启三年四月甲辰朔)	
郑汉章	曹州冤句人,在黄巢军中当毕师铎的副将,跟他降顺于高骈(T 卷二五七光启三年四月)	淮宁军使(同左)	
秦彦	徐州人,成了黄巢军将,乾符六年降顺于高骈(T 卷二五三乾符六年正月)	和州刺史(B 卷三《谢秦彦等正授刺史状》),以兵力自己,为宣歙观察使(T 卷二五五中和二年十二月)	
许勅	成了黄巢军将,乾符六年降顺于高骈(T 卷二五三乾符六年正月)	滁州刺史(B 卷三《谢秦彦等正授刺史状》),光启二年十二月攻击舒州(T 卷二五六光启二年十二月)	
李罕之	陈州项城人,成了黄巢军将,乾符六年降顺于高骈(T 卷二五三乾符六年正月)	光州刺史(B 卷一二《光州李罕之》)后来“为秦宗权所攻,弃城奔项城”(T 卷二五五中和三年二月)	

由此可见,吕用之发迹前大部分武官们的特色如下:第一,是在西北、西南边疆御边型藩镇经历多次战斗的将兵(显著的例子如梁缙、张、安再荣、任从海等);第二,在高骈历任的藩镇与他相识,成为亲将、部曲而随他“历数镇”(梁缙、雷满、任从海等)。除此以外,据记载被叫做“旧将”的人(张璘、陈珙、冯绶等)可能也有这些特色。藩帅高骈跟武官们的这种关系,也是在唐朝全体军政上结合的。高骈也任用了从黄巢起义军中招降过来的人(如毕师铎、郑汉章、秦彦、许勅、李罕之、徐约等)。招降以后,他们对镇压黄巢起义军很积极,也未跟“旧将”们对立。尤其是毕师铎当了左厢都知兵马使,开始时跟张璘、梁缙一起立下了功绩。另外,在财政方面,高骈采取了与以前的统帅不同的方略。这就是广明元年(880)二月的“改扬子院为发远使”(5 [p. 8221]),因此他开始统括淮南周边盐专卖的财政机构(巡院、盐监及盐场)和权限(15 [p. 458])。总之,当时高骈的方针是通过再次改编专卖机构、整顿专卖权限以确保财源,同时,基于唐朝常规军政措施来集合兵力,并让跟自己有密切关系的武官来领导。就这样,广明元年(880)五月高骈差点就打败了黄巢起义军,但他却轻信了黄巢的假降而让各地节度使撤兵回去,接着七月又不迎击、追击黄巢,最后导致了黄巢起义军复活、渡淮、十二月入长安城的结果。关于高骈个人的意图,在此无需赘言。但笔者还是想强调一下当时长安城陷落事件的严重性。不但多数官僚、贵族们被杀害,而且在“道路梗涩,奏报难通”(5 [p. 8241])的情况下,不得不授予各地节度使以“墨敕”——实即自由任用官僚的权力,其结果是唐朝政府完全失去了对节度使属下官吏的任命权(2 [p. 945]),并且各节度使之间也开始发生人事方面的冲突,互侵领域。由此可见,对于末期唐王朝来说,在全国范围内官吏的任命权就是惟一的统治根据。一旦失去这一权力,国家的财政与军政也就由此分裂,无从统一,分裂割据的局势从此形成。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未能出兵迎击黄巢,高骈被解除了盐铁转运使、诸道行营都统(882 年 5

月等职,于是“骈臣节既亏,自是贡赋遂绝”〔5〕p.8271〕。《笔耕集》有好几通文书记载了高骈方面对于这些事态的辩解〔16〕pp.18-30〕。当然,这些文书的内容不一定都可信,但考虑到在全国范围内漕运、联络的停滞,至少可以说高骈不追击黄巢、“贡赋遂绝”,未必是对唐朝政府背信弃义。

无论高骈的初衷是什么,唐王朝的财政与军政最终大部分都崩溃了。这一局势使得高骈和他统治的淮南以及其他的东南藩镇,都遇到了从未经历过的局面。

### 三、淮南发生的事态与“妖人”的发迹

广明元年(880)以后,高骈跟他领导的武将们的关系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学术界向来都用“妖人吕用之之党”的阴谋〔3〕p.249〕来说明这两个变化。但笔者认为,实际上这些变化是由于当时的财政、军政崩溃而引起的。《笔耕集》卷五《奏请天征军任从海衣粮状》〔4〕pp.23-24〕是考察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史料:“天征军都将任从海、及节级军将、并官健、总二百八十七人。”右。臣得,都将任从海及节级状。称,自赴征行,已逾五载。累会沿海袭贼,上江防虞。去年军都放回本道。从海等且在当府,愿随行营者。各得家信,知西川已停衣粮。优缘从海等,皆之贫寒,更无营业,彼处父母亲属,便须委壑填沟。请具奏论,乞还衣粮者……伏以任从海等,万里从戎,五年于役,不辞艰险,愿尽勤劳。今者身在东吴,职居西蜀。此方苦于蜚旅,彼已停其衣粮。远路音书,难写征人之恨,贫家亲戚,先怀饿殍之忧。伏遇陛下,暂幸龟城,未回龙阙。三川草木,别有光荣,万户蒸黎,永能苏息。而任从海等,久离本镇,不睹特恩,望雨露之均沾,恨烟波之回隔。固甚伤悯。辄具奏论,优乞圣慈,允臣所请,特令本道却给全粮,所冀凤驾巡游。士卒皆知其有幸,鸿慈煦育,君亲必表于无私。谨具录奏闻,伏听敕旨。”

根据“伏遇陛下,暂幸龟城,未回龙阙”一语,可以确认这一文书是唐僖宗向成都逃跑的中和元年(881)正月以后所写的。又据“去年军都放回本道”句,可确认是高骈让别的节度使兵士返回的翌年,也即中和元年之内。文中提到的“任从海”,本属剑南西川节度使官健的下级指挥官,随高骈经历过五年军务,可能历任荆南、镇海、淮南节度使。从这条史料可知,驻军于淮南的西川兵士任从海等人从家信中得知留在西川的家属衣粮没领到,于是开始动摇,要求成都的唐朝政府支付全粮。《通鉴》卷二五八大顺元年(890)四月乙丑条记有“蜀州刺史任从海”这个名字〔5〕p.8395〕。如果这两条记载所指为同一人,那么不管原因如何,总之任从海后来的确离开淮南,返回了西川。

我们已经知道高骈所统率的武将的共同特色。换言之,他们本来不属于淮南,而是属于昭义节度使、荆南节度使等外地的军兵。据此推断,任从海等官健的动摇不应被视作个案,而可能是在唐王朝全国性财政、军政崩溃的局势下所出现的武将们的常态。当时在淮南的事态显然比在桂州庞勋起义开始的时候复杂、严重得多了。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是否背叛高骈,返回原藩镇的是任从海、雷满等人,没返回原藩镇而往别处逃跑的,是张、韩师德等人。留在淮南的梁缙等人(也可能有其他“旧将”)处境也不妙,因为他们的统制、供给都需要全国性统制及跟别的节度使之间的联系。总之,曾被称为“皆良将劲兵”〔3〕p.253〕的高骈军队,至此已成了一支无法统一行动的杂牌军。

高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起用“妖人吕用之之党”的。据《妖乱志》记载:“明年(879),渤海移镇,用之固请戎服,遂署右职。”〔3〕p.249〕这是已经当观察推官的吕用之抬头的第一步。《笔耕集》卷一四所载《吕用之兼管山阳都知兵马使》制文云:“(吕用之)庆袭玉璫,业精金板。遵直道而利有攸往,奉公家而知无不为。是以作新军,权资处右……无辞两役。穷猿既切于投林,飞鸟犹思于择木。”〔4〕p.77〕在这里,“今以属城多难,散卒无依”一语,符合前述淮南节度使的情况。又,文中提到的吕用之所作之“新军”,可能就是《妖乱志》等史书所记载的“莫邪都”。据《通鉴》卷二五四中和二年四月条:“用之又欲以兵威胁制诸将,请选募诸军骁勇之士二万人,号左、右莫邪都。骈即以张守一及用之为左右莫

邪军使, 署置将吏如帅府……〔5〕p.8267)这个莫邪都, 在史书中一直被认为只是“妖人”的阴谋之一而已。但是, 据前引《笔耕集》制文来重新考察, 就可以发现它其实是为剔除“无法统一行动的杂牌军”弊病的一个方略, 而且高骈选“旧将”以外的人当指挥官, 也并非没有道理。高骈跟吕用之剥夺“旧将”的兵权并暗杀他们, 应该也是在淮南军政的动乱并重新组建的过程中所发生的事。那么, 高骈为什么选中了吕用之与张守一, 而不是别人? 重新考察一下吕、张两人的情况, 可以发现, 他们具有“鄱阳茶商之子也, 久客广陵, 熟其人情”〔5〕p.8264)等下层商人的社会特性。从后来吕用之等所纠集的人来看, 出于宗教方面的原因较少, 大多是跟扬州周边盐铁专卖有关的人, 或者是下级胥吏。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即是吴尧卿。此人出身贫寒, 人品鄙劣; “尘污官省, 三数年间, 盗用盐铁钱六十万缗”, 但曾任扬州周边盐铁专卖之职, 经验丰富, 为诸葛殷等所底抗〔3〕p.251)。

据前所述, 黄巢起义以前, 为出征兵士提供财政保障的, 并非东南藩镇, 而是这些兵士原属的藩镇。换言之, 虽然东南藩镇财富丰赡, 可是它们没有相应的财政机构可以长期维持大量兵员。虽然高骈让诸节度使兵力回去, 但是仅莫邪都就有两万的兵员, 财政压力很大。实际上, 高骈再次改编长期维持大量兵员的财政机构, 在广明元年(880)就已经开始了。这就是上面已经讲过的同年二月在扬州扬子院设置发运使, 使之统括淮南周边盐专卖的财政机构和权限。为了切实掌握这些原属唐朝中央政府的机构, 高骈可能需要派遣自己的亲信前去, 这就成了“妖人之党”迅速发迹的前提。

由此说来, “妖人之党”在宗教方面的特点其实并不重要。在笔者看来, 当时的淮南节度使出于改革军政与财政机构之需要, 开始利用商人的知识, 加之双方在宗教上具有一定共性, 再加上后来由于这些机构本身的权利需要, 更促使这些官员互相勾结, 并迅速发展——这就是所谓“妖人之党”的实质。如果可以把高骈和吕用之一系列的举措看作走向割据、独立的一种“改革”的话, 他们其实是淮南节度使改革的旗手。

#### 四、高骈与“妖人”们的结局

淮南节度使的“改革”从根本上看, 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中和元年(881)以后, 高骈实际所能控制的只剩下了扬州及其周边地区而已。这既是由当时在东南财源型藩镇随处可见的独立各州郡互相斗争的状态, 又是由唐朝统治下会府与支州的统制关系崩溃所造成的。

《笔耕集》卷五所收的为拒绝唐朝中央政府出兵要求而奏上的《奏论抽发兵士状》, 记载了这个情况: “……臣(即是高骈)当管庐州和与州, 旧有讎嫌, 今至疑忌, 惟谋以怨报怨, 未遂知和而和。孙端新授滁州, 又与秦彦有隙。既是滁和接境, 动有他虞。若于光蔡会军, 必酬旧憾。事非便稳。理合奏论, 臣得招降, 多方控驭, 粗能禁戢, 免有动摇。如令各出兵戈, 必恐自相鱼肉, 辄陈利害……”〔4〕p.24)

这里与秦彦一并提到的孙端, 本来也是黄巢以外的起义军首领之一, 后降顺于高骈, 中和三年(883)以后占据和州〔3〕p.253)。“自相鱼肉, 辄陈利害”一语, 反映了当时各州斗争的激烈性。高骈派到淮南各州的诸将(其中大部分是从黄巢起义军招降而来的)摆脱了他的控制, 有的逃跑, 有的攻击邻州(参见表3)。当时作为会府的扬州, 实际上已成了一个孤立的州。所谓“妖人之党”的活动范围, 也都是在扬州周边而已。光启三年(887)四月, 在淮南西北方的蔡州节度使即将进攻扬州前夕, 吕用之与左厢都知兵马使毕师铎之间的对立突然公开化。这“毕师铎之乱”的动机, 是反对吕用之掌握军政, 可是当时参与“毕师铎之乱”的人如郑汉章、张雄、秦彦等, 都跟毕师铎具有个人关系, 且属扬州城以外的武将。因此, 笔者认为, 当时扬州的孤立性无疑促使了叛乱的扩大。

高骈与吕用之灭亡的另一个原因, 就是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前文主要根据《笔耕集》的记载将他们的历史活动视为在当时情况下具有一定合理性的“改革”与两人之间的合作。但随着事件的演进, 高骈的权力确实渐渐地被吕用之侵夺, 从而在淮南节度使内部形成了二重权力的状态。



在“毕师铎之乱”扬州城被包围之时，高骈与吕用之不但未能共同守城，而且开始对立，前者据守子城，后者据守罗城。两者之间内讧的结果，是吕用之的逃跑与毕师铎的入城。

以后，从周边侵入的诸军事集团在扬州一个接一个地混战，高骈、吕用之都无法取得主动，终于到翌年（888）二月，除高骈与吕用之外，残存的“旧将”如梁纘、韩问等；“妖人之党”如张守一、诸葛殷等，全都被杀。《新唐书》卷二二四下《高骈传》载：“扬州雄富冠天下，自（毕）师铎、（杨）行密、（孙）儒迭攻守，焚市落，剽民人，民饥相仍，其地遂空。”[7]（p.6404）这就是高骈与“妖人”们的结局。

唐代后期的藩镇体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维持唐朝中央政府的作用。因此，至少就东南财源型藩镇的军政、财政而言，需要唐王朝全国统治的安定。由于黄巢入长安导致唐王朝统治的崩溃，影响巨大。实际上，原来基于唐王朝政府任命的东南财源型藩镇之中，高骈的淮南节度使是保留时间最长的一个。但是这也需要军政、财政两部门的全面刷新。从它的灭亡可见，在各州府互相斗争的唐末期，割据独立并不容易。也正在这一过程中，随着地方豪强阶层参与政治，为宋朝以后士大夫阶级之兴起奠定了基础。

### 〔参 考 文 献〕

- [1] 张国刚. 唐代藩镇研究[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9.
- [2] 中村裕一. 唐代フノつてキユツヒ締女ウ[M]. 东京: 汲古书院, 1991.
- [3] 雍文华(校辑). 罗隐集·广陵妖乱志[Z].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245 - 255.
- [4] 崔致远. 桂苑笔耕集[Z]. 台北: 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正编》本, 1979.
- [5]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56.
- [6] 刘煦. 旧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75.
- [7] 欧阳修. 新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75.
- [8] 杜牧. 樊川文集·上李太尉论江贼书·卷一[ Z ]. 台北: 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正编》本, 1979.
- [9] 陈耆乡. 嘉定赤城志·辨误门·卷四〇[ Z ]. 台北: 中国地志研究会《宋元地方志丛书》本, 1978.
- [10] 宋敏求. 唐大诏令集·卷一二〇[ M ]. 上海: 学林出版社点校本, 1992.
- [11] 伊勢仙太郎. 安史の乱後における多くの太「民族の中国進出」[ J ]. 東京学芸大学摘要, 1969 2(3) 89 - 108.
- [12] 王钦若. 册府元龟·将帅部纵敌·卷四四七[ Z ].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 [13] 薛居正. 旧五代史·雷满传·卷一七[ M ]. 北京: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76.
- [14] 李昉. 太平广记·张守一·卷二八九[ Z ]. 北京: 中华书局标点本, 1961.
- [15] 高桥继男. 唐代後半期盐铁转运巡院制に關する若干の考察[ A ]. 中国唐代学会编辑委员会. 第三届中国唐代文化学术检讨会论文集[ C ]. 台北: 中国唐代学会, 1997. 443 - 463.
- [16] 周藤吉之. 唐末淮南高骈の藩镇体 と黄巢徒党との轢关 について新罗末の崔致远的书『桂苑笔耕集』に中心レテ[ J ]. 东洋学报, 1987 68(3 A) 1 - 36.

## The End of the Tang Dynasty's Military Rule and the Beginning of Separate Rules in the Five Dynasties Period

SHANGEN Zhi-sheng

( Department of History , Zhejiang University , Hangzhou 310028 , China )

**Abstract :** The later period of the Tang dynasty has been said to be the age of political power split , against which , however , a counterargument has recently been stated . To give a correct answer to the questions - when and how the Tang Dynasty started to collapse , and how the new administration was established after the

disunion, it is necessary to introduce the case of Gao Pian, the military commissioner of Huainan (Huainan Jiedushi) in the Tang Dynasty. Gao has been recognized as a man who indulged himself in Taoism. According to Guiyuan Bigengji (桂苑笔耕集) written by Cui Zhiyuan, however, what Gao Pian did in Huainan was to actually carry out a sort of reform. His army group was composed of veteran generals and other officers who had guarded the western frontier. His failure to capture Huang Chao, the leader of the peasant uprising, caused the fall of the capital. Meanwhile, his group also failed to function as before.

The purpose of Gao's reform was to achieve independence from the Tang Dynasty that was then in a critical condition of military rule and financial collapse. Those leading the reform were the group headed by the Taoist magician Lu Yongzhi. They were characteristic of businessmen in the low class and related to salt monopoly around Yangzhou. What caused the failure of the reform were the conflicts going on among various prefectures at that time. These conflicts came to become a political subject for various regional political forces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 period.

**Key words:** Gao Pian; Lu Yongzhi; military commissioner of Huainan (Huainan Jiedushi); separate rules

## 大学出版社如何应对教材出版发行体制改革新趋势

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学出版社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经过二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已成为出版界的重要力量,为我国的文化事业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然而,由于历史和体制等多种原因,到目前为止,大学出版社基本上游离于中小学教材出版范围之外,这一现象不仅不正常,而且也有悖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大方向,有碍于我国出版业的健康发展,并且也造成了诸如中小学教材价格居高难下等问题。

2001年,经国务院同意,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国家计委联合颁发了一系列旨在打破部门垄断、引进竞争机制、切实降低中小学教材价格的文件,拉开了改革的序幕。经过了一年多的试点,已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并产生了明显的效果,目前已开始全面推进。这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也是一项涉及面广、重组性强的系统工程。在这样的新的改革与发展趋势下,大学出版社应如何做出积极的应对,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全新课题。笔者认为,对此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分析:

### (一) 充分发挥大学出版社自身的优势,积极参与出版发行体制改革

与地方出版社不同,每个大学出版社都依托于一所大学,而且往往是办学层次较高的大学,信息量大、创新能力强、研究力量(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开发力量)雄厚,是这些大学最显著的特点。作为一所大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大学出版社在很大程度上共享着这些定足珍贵的出版资源,而这正是大学出版社的优势所在。大学出版社与所在大学的研究力量有着天然的联系。大学出版社要充分利用大学的学术背景,充分挖掘大学的学术资源,组织校内外专家投入到教材的开发与编写工作中,从一开始就形成与众不同的教材研发模式,高屋建瓴地推出优质教材品种。发达国家教材改革的经验也表明,中小学教材的开发没有高水平科学家的参与是很难成功的。美国在20世纪中叶进行了一项大规模的中小学教材改革,并且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项改革的主持人就是哈佛大学教授布鲁纳,他不仅提供了教材改革的新的指导思想,而且直接参与了教材编写的主持工作。目前,由科学家主持中小学教材编写,已成为发达国家教材出版工作的一个基本模式。

### (二) 大学出版社要以特色求生存,以品牌走市场

在垄断的情况下,生存不会成为问题,因此,经营问题是不需要考虑的,也不会花大力气去经营品牌,求权、求全、求大,是一个普遍的“发展模式”。然而,一旦形成竞争机制,采取诸如“招标投标”等市场行为模式,特色和品牌就成为出版社的立足之本。大学出版社由于涉及中小学教材出版业务不多,经验不足,需要有一个认真而谨慎的调查与研究过程。但经验不足同时也是一个优势,因为没有太多习惯思维的限制和患得患失的犹豫,可以在一个全新的平台上构筑起自身的参天大厦。在这个方面,笔者认为,大学出版社必须首先摒弃“伤其十指”的传统出版思路,要在“断其一指”上狠下工夫,即根据所在大学的学科特色,确定自己的主攻方向,要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自己的教材“品牌”。这类教材不应是“系列的”,不应是“取代别人”的,而是可供中小学校选用的“套餐”之一,是齐放的“百花”之一。

### (三) 大学出版社要瞄准国际教材出版的前沿,努力提高教材的“附加值”

中小学教材出版发行体制改革的直接意义,是改革不能适应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现行管理模式,切实有效地降低中小学教材价格。但笔者认为,这一改革潜在着极为深远的意义,是满足加入WTO后我国中小学教材出版与国际教材出版接轨的需要,是满足我国中小学教材业能尽快跻身于国际先进行列的需要。在这个意义上,出版教材需要有一定的比较与研究作为支撑。应该看到,近几十年来,国外中小学教材的出版处于一种白热化的竞争状态,变化之大、发展之快,令人目不暇接,包括教材内容、选编方式、印刷技术等,都在不断地推陈出新。在这种竞争中,各出版社大都依靠先进的教育理念和科学技术,以求出奇制胜。在这个方面,大学出版社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它不仅有较雄厚的研究力量,而且有固定的联系渠道,能在第一时间获得有关信息。

### (四) 大学出版社必须走出传统的办社方针,深入研究教育改革的实践与需要

毋庸讳言,有许多大学出版社满足于固守在“象牙塔”中,多出版“学术著作”,缺乏关注社会、关注中小学校轰轰烈烈进行素质教育改革的热情。这既有体制上的原因,也有认识上的原因。中小学教材出版与发行的改革,也呼吁大学出版社走出传统模式。

如近年来,为了切实有效地推进素质教育,我国正在开展大规模的义务教育课程改革,数以千计的专家参与到了这项改革之中,其改革力度之大、涉及范围之广,为建国以来之最。大学出版社要参与中小学教材的出版,就必须研究教育改革的实践,就必须关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理念、新趋势、新内容、新方法。事实上,教学内容的不断更新,也是一个世界性的潮流。例如,德国中小学大约每十年重新制定一次学科教学大纲,每一次大纲的重新制定,都导致教材的重新编写与出版。如果大学出版社不认真研究教育改革与实践,不认真研究教育发展的基本趋势,就不能把握教育发展的方向,中小学教材的出版更无从谈起。

当然,并不是所有大学出版社都有能力而且有必要参与中小学教材出版工作。确切地说,中小学教材出版与发行的改革,给一些有志于基础教育改革的大学出版社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空间。同时,通过大学出版社积极参与中小学教材的出版与发行,也能为推进市场经济改革、繁荣图书出版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李玲如)